

河东记忆

一方县志中的百年回响

——从民国《临晋县志》看文脉赓续

□许琛

在浩瀚的史书中，县志无疑是一处地方历史文化的宝库。百年前一位临晋县长关于修志的叙述，不仅展现了志书编撰的艰辛与庄严，也凝结着一位地方官员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忧思。1923年冬月，时任临晋县知事俞家骥在《临晋县志》序言中，全面回顾了这一志书的修纂经过，其文笔沉着，情感真挚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当地文化的深情。

典籍有据

俞家骥先生自1920年由榆次调任临晋伊始，便察觉县志缺失的严峻现实。他在序言中写道，光绪庚辰年（1880年）艾绍濂曾对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王正茂所纂《临晋县志》进行续修，然因战乱频仍、水患侵袭，志书多已散佚。俞家骥先生忧心忡忡地指出：“今失不修，后将无徵矣。”这一表述，道出了县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“集大成者”的不可替代地位。

民国初年，正值中国内忧外患、军阀割据、民生凋敝之际，一部地方志的完成，不仅难能可贵，更显其背后推动者的魄力与理想。更为感人的是，面对经费短缺、人手不足等困难，俞家骥并未退却。他与本地士绅商议未果后，积极向许海澜先生（许鉴观，字海澜，原雁门道道尹，临猗县临晋镇许家庄人）求助，后者慷慨捐出俸禄千圆支持修志之举，并嘱托俞家骥“主其事”。两位地方大员之间的交谈朴实无华，却体现出一种对家国文化命脉的深刻认知与共同责任。

志体有序

从序言来看，俞家骥不仅身体力行，还深入参与了修志体例的确定与主笔人员的遴选。在他看来，赵意空所著《乡宁志》体例精审、笔力雄健，遂通过友人介绍，邀请其主纂临晋新志，并推荐宿儒于延梁为其副手。在

两位主笔的组织下，《临晋县志》于1921年仲冬开笔，至1923年春成稿，冬季付梓问世。遗憾的是，襄助此事的许海澜先生于前岁辞世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

全志大纲共分六部：图、考、略、谱、录、记。其中，“图”与“考”并行，既有地图实测绘制，又有沿革、疆域、城邑等注释说明；“略”则涵盖物产、赋税、职业、风俗、军政等社会生活全貌；“谱”着眼于人事制度，记载清代与民国地方官员与科名选举者；“录”重在人物精神风貌，设有名臣录、乡贤录、烈女录；而“记”则将古迹、金石、掌故旧闻一一记载，兼收并蓄，力图完备。

俞家骥先生特别强调了“宁简毋繁、宁缺毋滥、宁淳朴毋粉饰”的编纂原则，并指出：“旧志之所载，不轻言删；新事之所增，更须慎之。”这一审慎、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为全志定下了基调，也正是其能成为今日研究临猗县人文历史、发展演化的重要原因。

情怀有深

为何在那个荒乱和变革交织的年代，一位地方官缘何如此重视修志？为何一位乡贤，会捐资千圆成就一部志书？

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的，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尊重，更是对时代风云的深刻体察。俞家骥先生曾求学于北京，许海澜先生早年留学日本，两人虽背景各异，但都在时代激荡之际开眼看世界，他们亲历清朝覆灭、科举废除、帝国侵凌，敏锐察觉到时代的断裂与剧变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，他们尝试去准确记录、完整保存本地的文化脉络，为定位历史提供坐标、为未来发展提供罗盘，他们的修志行动，不只是时冲动，而是对创造未来的理性判断。在这本县志编写的26年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

这次县志编写，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延续，也是现代意识的先声。今天



▲俞家骥，1920年任临晋县知县，1925年任雁门道道尹，1956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的我们，生活在信息爆炸、文化更迭迅速的时代，如何重建共同记忆、保存地方文化基因、理解社会结构的演变，县志的内容和创造过程正提供了宝贵的路径。

历史回音

县志，不仅是地方官治理成果的汇编，更是地域社会文明的缩影。一方志书，承载着百姓的生活方式、生产结构、文化习俗、教育发展与道德认知；它不仅记录过去，更为后人提供了认知自身、了解祖先、重建身份的重要途径。

百年之后，再次翻阅《临晋县志》，创作者笔下对文献整理的执着、对史实求真的严谨、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记述，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，一份文化的托付。

百年之前，俞家骥先生在县志序言末尾写道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。”他以自身微力，践行着“立言”之道，成就了这一“可与天地并久”的文化事业。百年之后，重读县志，不仅是在追寻一段文字的历史，更是在对一代人的文化使命致敬。今天，我们更应从这样的文化传承者身上汲取精神力量，担当起守护历史、赓续文脉的使命，以笔为耕、以志为田，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答卷。

明清以后，人们借樱桃寄托情怀的意愿也并未消减。郑板桥在《天仙子·惜樱桃》中，以“翡翠玉盘红玛瑙”赞叹其美，又借“她自向东愁欲倒”抒发对美好易逝的惋惜。

近代诗人杨柳青“红艳欲滴若宝石”的描写，既传承古典韵味，又以“桃鲜杏艳不争浓”赋予樱桃淡泊品格，展现新时代文人的精神追求。

从《诗经》时代的宗庙祭品，到唐诗宋词中的风雅意象，再到明清文人的情感寄托，樱桃始终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。“樱桃小口”的经典比喻，将果实的玲珑与美人的娇态完美联系；《西厢记》“胭脂浅淡樱桃颗”的名句，也将樱桃提升为古典美学的重要符号。这枚小小的果实，早已超越自然属性，化作承载民族审美与情感的文化密码。

当我们品尝樱桃时，舌尖上的不仅是酸甜滋味，更是千年文脉的流转，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珠上凝结着先民的智慧、诗人的灵感，以及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。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，关于樱桃的咏叹仍在继续，等待着后人去发现、去续写新的诗意篇章。

运城珍宝馆

门神神荼、郁垒砖雕： 绵延千年的门上春秋

□记者 杨颖琦

每到春节的时候，除了贴对联、福字，许多人家还会在大门上贴门神，这些或威武、或和善的形象，为我们的传统佳节增添了诸多文化魅力。那么，这一传统习俗是怎样诞生的？它又历经了哪些变化？今天，就让我们从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门神茶（shēn shā）、郁垒（yù lù）砖雕讲起。

作为地下世界的守护者，这对来自金代的门神神荼、郁垒砖雕向我们传递着千年前的文化信息。在这两块长方形砖雕上，两位神将头戴盔甲、身披甲、护背旗，手执兵器，一左一右，相对而立。面部线条看起来刚劲有力，眼神锐利而深邃，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魑魅魍魉；身材则魁梧壮硕，肌肉线条在衣物下若隐若现，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感。

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神荼、郁垒形象相比，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这对砖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在服饰方面，其风格融合了中原传统服饰元素与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，长袍的款式、花纹带有中原文化的典雅韵味，而袖口、领口等细节处的装饰则体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放风格。在人物造型上，这对砖雕既保留了神荼、郁垒传统的威严庄重，又融入了金代刚柔并济、质朴清秀的审美观念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、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。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，与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金代疆域辽阔，民族融合频繁，河东一带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带，因此这对砖雕在传承传统门神形象的基础上，吸收了多元文化元素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追根溯源，“门神”一词最早见于《礼记·丧服大记》，东汉郑玄注：“君释菜，以礼门神也。”秦汉时期，门神形象逐渐清晰，神荼、郁垒的名字也开始流传。汉代王充的《论衡·订鬼》中载：“沧海之中，有度朔之山。上有大桃木，其屈蟠三千里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垒，主阅领万鬼。恶害之鬼，执以苇索而以食虎。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，立大桃人，门户画神荼、郁垒与虎，悬苇索以御。”到了唐代，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患病时，常听到门外有鬼魅呼号，秦琼和尉迟恭便主动请缨为其守夜，从此唐太宗便无虞。于是他们的形象被人们画了下来贴在门上，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门神之一。

其实，“神荼”是一种叫荼草的植物，百虫不侵，取避疫之意；“郁垒”是螺蛳，遇到危险就蜷缩硬壳中，取保宅平安的意思。先民在创造的神话中把神荼、郁垒“人化”，作为对平安顺遂生活的祈福和祝福。在生活中，人们也会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、郁垒的名字挂门上，即“桃符”，北宋诗人王安石所写的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描绘的就是春节人们换桃符的情景。如今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很多传统习俗在现代生活的浪潮中逐渐消失，但门神这一传统仍在很多家庭的大门上坚守着。在人们心中，门神不仅仅是一种装饰，更是守护我们家庭平安和谐的象征。



门神神荼砖雕



门神郁垒砖雕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门神神荼、郁垒砖雕

出生时间：金代

尺寸：宽29厘米、高18厘米、厚2.5厘米；

高30厘米、宽19厘米、厚3厘米
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